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视角

□刘金祥

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和文化学的重要维度，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起源、传承、流布等方面与地理环境内在关系的学科，其主旨在于探讨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以及这些文化定型活动在改变人文环境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一些论者将文化地理学引入文艺批评的视域，发掘和解读文艺作品的文化地理意蕴，提升了文艺批评的品位和层次。鉴于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尚处于不自觉状态，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梳理和解析。

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发轫于文化社会学与现代文化地理学的交汇与融和。文化社会学强调社会环境，包括历史、人文、宗教、风俗、法律、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等因素对文学艺术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这就决定了文艺批评必须从社会环境角度对文艺作品进行观照和审视。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地理观念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关注地理观念对于文艺叙述在审美世界里所涵育的新的地理空间形式，它与文学艺术对地理环境及其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认识和表达，在本质上迥然有别，因为文学艺术是叙述者经过所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中间环节加以实现和体现的。文艺批评既包含一定的思想内涵，同时又带有评论者的价值判断，而发掘思想内涵和建构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文化地理学方法的支持和引导，换言之，文艺批评只有准确揭示一定历史条件下文艺作品对地理环境的状绘和摹写，以及这种状绘和摹写所形成的审美个性和审美风格，才能深透地袒露蕴含其中的意识形态意蕴。所以，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不仅能够扩展人类审美的地理空间，而且能够彰显社会发展的人文风貌。

把握和处理好文学艺术创作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文艺创作的品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文艺批评方法的生成。西方早期的文艺理论家既把文学艺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作为阐释内容，也把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纳入论述范畴，并将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融为一体加以考察言说。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在其所著的《新科学》一书中，就把对诗歌起源的探究放在远古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之中。法国斯达尔夫人在其《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中，从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等社会因素层面打量文学艺术，并阐述了文学对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的反作用，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环境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她对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表现出浓厚兴趣，指出西欧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与地理要素似乎密不可分。19世纪欧洲文化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出发研究环境与文学艺术形成的内在肌理，他把文学艺术看作是“绝对理念”的演化形式，认为文学艺术是时代、环境、民族观念的综合体现，其中的环境既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自然环境。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本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论断，是西方较早从地理环境视角诠释文学艺术起源和创作的重要哲学家之一。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泰纳，在吸纳孟德斯鸠德的文学地理学方法、斯达尔夫人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和黑格尔的“理念论”的前提下，提出了种族、环境和时代是文学艺术本质的三个决定性元素。在这里，尽管泰纳所讲的“环境”仍然是指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但与斯达尔夫人等文学社会学家不同的是，泰纳鲜明地指出，“居住在寒冷潮湿地理环境下的民族，受环境困扰生成忧郁性格，倾向于狂醉、贪食，渴望战斗流血的生活；而居住在地理环境美丽的海岸的民族，则向往航海和商业，偏爱社会的事物、雄辩术、科学发明、艺术等”，更加注重强调自然环境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

作为文学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批评，客观上决定了必然要将触角延伸至文化地理学境域。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取向，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延续至今，主要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当代地理科学，以及文化产业兴起等诸因素的影响，相对成熟的文化地理学文艺批评模式，当首推英国文化学者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该书从理论批评角度对文化地理学的文艺批评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提出“缺少文化地理考量的文艺批评是蹩脚的和不可靠的”著名观点。而以文化地理学原理统领文艺批评的代表性著作，应该是美国文化地理学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两部专著。这两部专著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文化两个方面对西方殖民统治时代文艺批评的规律、特点和本质进行了深层揭示。

与孟德斯鸠、黑格尔等西方著名思想家倡导地理环境决定文化和文学的地理决定论者不同，迈克·克朗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的落脚点，在于研究“文化是怎样塑造日常空间的”，也就是说，他注重研究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文化传播媒介的文化传播的能动性作用，研究它们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空间观念和地理意识形成的影响。迈克·克朗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思考了国家、民族、商业、公司、商店、商品、文学、音乐、电影等在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研究了居住地区特别是地理环境对人们产生的各种影响。在《文化地理学》中，迈克·克朗首先从众多关于“文化”的界说中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认为文化是“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它们使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意义，生活中那些物资的形式和具有象征性的形式产生于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明确提出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就是注重“研究文化在现实地域空间中的作用问题”。在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视野里，文化尽管作为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绝非生活的剩余物，不是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的东西，它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从这种观点来看，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就是与人们的生活和创造紧密相连，没有一定的文化观念就不可能催生和冶炼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因此，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地理环境的叙述和描写，以及文学艺术关于地理环境叙述和描写所生成的审美形式，就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研究、分析、认识一定的社会文化，就必须研究它的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中的地理空间的叙述、描写及建立在其上的审美形式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由此可以看出，迈克·克朗的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就是揭示文学艺术创作审美形式的社会意义，揭示文学艺术对于地理空间的叙述和描写以及这种叙述和描写形成的审美形式的社会价值。爱德华·W.萨义德对文艺批评的定义则更多地带有文化地理学的色彩，他认为所谓文艺批评“有两重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等活动，这些活动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它们通常以美学形式而存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娱乐”。他指出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对于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因为小说的“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萨义德通过对小说家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等人作品的美学分析，阐明了西方小说美学形式的生成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统治不无关系，笃化了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立场。

我国尽管迄今尚未构建完整而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和机制，但古代文人早已认识到地理环境与作家人品养成、与文学艺术作品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先秦时期的文艺批评论著《毛诗序》就主张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将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我国第一部文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调详尽细密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文学艺术演进的影响，以及文学艺术对于环境意识形成的反作用。检测和裁断中国诗歌散文最根本的审美标准是“意境说”，而意境的生成就是自然环境中情与景的交融。因此，我国诗歌散文强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情感的引发作用，以及反过来诗歌散文审美形式对于人类情感的升华作用。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自然地理学的批评，就建立于“文以载道”的哲学基础之上。《文心雕龙》首篇《原道》指出，“文之为德者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把“文”区分为形文、声文和情文，人文源自于太极、源自于自然。诗歌散文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为我国古代诗论的重要内容。

与西方不同，我国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无论是古代的诗论和文论，还是现当代关于乡土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研究，更偏重于强调地缘特征对于文学艺术风格生成的内在作用；而西方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则既研究地理环境与文学艺术生成的关系，又注重人类通过对地缘环境的认知理解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内涵，进而确立话语权者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态度和现实政治态度，而这些强势者的日常生活态度和现实政治态度，又决定着文艺批评在不同地理空间的表现形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地理空间：一个是实际生活中的地理空间；一个是处于一定地理环境下的人们对自己以及其他地理空间的认识和理解，前者客观地存在着，只有以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才能加以揭橥和评骘，而后者却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文化判断，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们，透过社会意识形态对于地理空间的认识和把握。与此相联系，存在着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地理空间意识和态度，以及在地理空间态度、观念的引领和统筹下，作家艺术家对地理空间的美学表达和艺术言说。可以说，文艺批评的文化地理学方法的价值在于，不仅展现了作家艺术家对地理空间的美学处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向人们传递了关于地理环境的历史态度和人文立场。

思辨与美的真诚守盼

□谭仲池

胡光凡的自选集《美的领悟与思考》是他从事40年学术研究和文艺评论的重要成果。

做一个好的文艺评论家是非常难的事。文艺批评不同于文艺创作，文艺创作可以借助丰富的生活和阅读积累，想象力与文学表达力，创作出好作品。而文艺批评家则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大量的深度的阅读，比较鉴别，乃至对作品的深刻思考和作者的深切了解，甚至直接感知，才能写出真正让人信服和中肯的评论文章。在这里评论家确实是“它们的奴仆”。评论家干的确实是“苦差事”。然而，更为珍贵的事实是，一篇好的评论文章，既可以让一个作品产生不同凡响的影响力，甚至轰动效应，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作品的定位，同时又可以廓清一个时期和阶段的文艺创作思潮与艺术追求、审美情趣，起到警醒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我以为是更为重要和独特的，更能体现一个评论家的思想高度、精神高度与人格光芒。

光凡好读书，敏于思考。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审美观为指导，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分析、评价一切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和作家作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从艺术中、从生活中探索美、发现美、鉴赏美、传播美，努力做到讲真话，抒真情，求真理。在评论工作中，他遵循鲁迅的教导：“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对作家作品既不“捧杀”，也不“棒杀”。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激浊扬清，“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华盖集·并非闲话(三)》）。力求充分发挥文艺理论批评对文艺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引导作用。他是作家艺术家的诤友和良师。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文艺作家之间的深情厚谊、心灵交流和形影雅致。

他研究作家，评论作品，从来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一边细读作品，一边把自己的所感、所悟、所思，凡得之于心者，立即注之于手——一一记在卡片上。几十年来，他积累的卡片竟有几抽屉！他对任何一个作品或作家的评论，都是真诚有致，极富责任，充满感情。从不随意马虎，望文生义，凭妄断和臆想行事。即使对数十万言的长篇，他都不读三遍不忍发言。正因为如此，他写出的文章、被评论的作品，往往能得出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对作家作品作出实事求是、深刻中肯而又富于创见的评价。他曾写过一篇《写出色彩来，写出情调来——评古华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古华读过后，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您能抓住色彩、情调为文，立意是新鲜的。我们的文学评论，实在应当从单一的‘思想剖析’中解脱出来，多探讨一些艺术问题，相信于作者、读者都会有益处些。所以我应当感谢您。”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光凡作为一个老文艺评论家的立场坚守与价值取向，应当让我们大家尊为楷模，以净化当下的文化时空。如前些年，针对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化时尚，大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他所写的评论文章，像《向文艺家进一言——从荧屏清宫戏热说起》《“选美热”的冷思考》《雅与俗：关注大众文化审美品位》《“男色”娱人：媚俗的新标本》《对“追星族”要引导，切勿蛊惑》《媒体不宜无休止地炒作〈色·戒〉》《娱乐，别忘了文化品位》等，都是有的放矢，直言不讳地针砭时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从不吞吞吐吐，含糊其言。这种品格文风堪为表率。

细读光凡书中的许多评论文章，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对作品评论时，特别注重作品的思想高度、精神高度和艺术高度的辨析。他对作品的思辨是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有时还是伦理的和“道德自然”的。而正是这种深邃而理性、人性与道德的合理思辨，使得他的文章极自然地走向美的殿堂与美的时空，美的情境中去捕捉，遥远与历史，想象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的灵魂观照与探觅。由之高贵、平淡、雅俗、奇特、诡秘、神圣、幽暗、光明、沉重，都会置于他的慧眼和诗心中，显现其作品自身具有的思想火焰、审美韵律、价值趋向，进而也坦露出作家的心志与艺德智慧与操守，勤奋与天资，甚至那微澜如水的人生旅途的情丝恨缕，离愁别情，眷恋与悲苍。

诗歌表达了我真实的生存状态

——访诗人骆英

□黄尚恩

“在媒体人的眼中，在大众面前，我是一个商人，其实我是一个诗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喜欢这样跟别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写诗时，他用“骆英”这个笔名，他至今已经出版了《都市流浪集》《小兔子及其他》《7+2登山日记》《绿度母》等10多部诗集。他设立的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会多年来积极扶持诗歌事业，得到了良好的反响。近期，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会成为了诗歌民间组织“世界诗歌运动”的成员，骆英也成为该组织的协调员。骆英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中国当下社会具有巨大的活力，中国诗歌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通过世界诗歌运动这个平台，我们要把中国诗歌的声音传递出去。”

记　者：您更多的是以商人的身份为人们所知，但却写了很多诗。写诗对您到底意味着什么？

骆　英：经商，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谋生；登山，是一种体验和逃避；写诗，却是我真实的生存状态。所以，我的诗其实是写给自己的。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美和丑，我要把它真实地表达出来。表达完了，我的心里也就平静了。我从没考虑我的诗读者会不会喜欢，因为我不想因为这些去“化装”那些诗作、去取悦社会和别人。它体现的是我真实的存在状态。因为有诗歌，我活得很坦然。我是好是坏，我都已经在诗歌中抒发完了。我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焦虑感。

记　者：面对一些诗人对您诗歌写作的质疑，您自称“一流登山家、二流企业家、三流诗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调侃？

骆　英：我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有清醒的判断，我做不了一个一流的诗人。我只是一个诗歌文本的提供者，我没有那种雄心，不像当下的一些诗人，大师情结很重。那么，我认为做一个三流诗人也挺好。当然，这样说也是为了一种防御。因为我商人的身份，好多人就不服气，“不就有钱嘛，你的诗才有名”。那我就说，“我都三流诗人了，你还跟我计较什么”。其实，一个诗人就是要写诗，算一流、二流还是三流都没关系。诗写出来，就不归作者来判断了。甚至，也不是由评论家来说了算。不是今天哪个评论家说我一流了我就一流了，或者谁说我不是诗人就不是诗人了。一切都只能交给时间和读者。“二流企业家”确实是真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流的，你就永远不会进步。二流的，你就会琢磨别人是怎么做的。这是企业家的姿态问题。“一流登山家”，我确实是。我2005年才开始登乞力马扎罗山，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走完了“7+2”（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点）。我现在想起来都佩服自己，竟然活着回来了。现在再叫我去登一遍珠峰，心理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记　者：从《小兔子及其他》到《第九夜》，您都特别注重对都市人所面对的生命困境进行反思。

骆　英：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当下的社会是最具活力的。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很多人都有强烈的焦虑感。这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城镇化，各种力量在较劲，很多问题也在涌现。中国的当代诗歌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现代性困境的核心所在，并针对它进行创作，能够激发出其他国家诗歌所没有的活力。实际上，诗人应该对这种困境进行言说、批判。中国当代诗歌要紧紧拥抱现代性，让诗歌回到社会现场，这样诗歌才会具有活力。你看惠特曼、圣琼·佩斯，还有艾略特、金斯堡的诗歌作品，都跟当代的现代性进程紧密结合——要么被卷进去了，要么去抗拒它。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生活越来越世俗化、物欲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诗人被边缘化，介入不到生活的核心地带。因而，现在中国很多诗人缺乏对现代性困境的认知，诗歌写作越来越讲究“纯诗”、“纯艺术”。因为作为一个商人，我也许跟别的诗人有些不一样，因为被卷入到当下社会的旋涡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当今社会所具有的活力与困境。这就是我为什么写出《小兔子》《第九夜》《绿度母》这些带有批判性作品的原因。

记　者：你认为自己是“诗歌的野蛮人”。一些评论家认为，骆英的诗“成也野蛮，败也野蛮”。你是特别看重这份“野蛮”吗？为什么不把诗作写得更加“精致”一些？

骆　英：我的诗歌为什么显得野蛮呢？因为大家都不这么写，只有我这么写。我有一个观点，野蛮的世界、野蛮的社会，只能用野蛮的语言来对应它。你无法面对一个彪形大汉，而去描眉绣花。这就是一种野蛮的思路。也就是说，既然生活这么丑，我就让它丑到极点，让你真正看到它到底有多丑。另外，我确实不大关注诗歌的语言。有的时候，你太关注语言、写得太工整，就把原来野蛮的锐气消磨掉了。我试图追求的是一种朴素的大悲大美。这是另外一种诗歌美学。这种诗歌美学我不知道怎么从理论上去概括它。我的诗集《第九夜》出版以后，有诗人和评论家就把它追踪到金斯堡的《嚎叫》上。当然，这是过奖了。

但我的诗歌创作无论表达什么，都有一个核心思想在其中：如何去看待现代性困境。比如在《7+2登山日记》中，我把一个完整的自然呈现出来，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大自然的纯美和伟大。我思考的是谁是大自然的主体等问题。因为自现代启蒙以来，我们始终以人为主体，认为人定胜天，不尊重自然。但是《7+2登山日记》想要表达的却是：山是伟大的，自然是伟大的，人是很渺小的。《绿度母》讲述的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困境：什么都讲究“大”——大民族、大国家、大文化……但是，我们在哪里？全部被消解掉了。我们生活在无限大的追求当中，带来了无限大的恐惧和焦虑。所以，在《绿度母》中，我写的都是很大、很空的东西，让人抓不住要领。这样的诗歌读起来，自然被觉得“野蛮”、“另类”。

记　者：《7+2登山日记》中的很多篇章都是您在登山的过程中写的。在极端危险的情境中写作，有何特殊的感受？

骆　英：我的诗歌，像《7+2登山日记》是拿命换来的。诗中写到的死亡，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每天都看到死亡的阴影。当下的人，可能会看到车把一个路人轧死了，虽然感到很悲伤，但毕竟跟你没太大关系。在高峰上就不一样，今天他可能还跟你坐在一块儿，等你再往上攀登，他就变成山上的石头了。这个非常震撼。在那种状态下，因为缺氧，人的思考方式会不一样。脱离了原来的城市环境，你不再那么世俗，思考得更加文学化、哲学化。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你就有创作的冲动。

在登阿空加瓜峰时，我被困了几天几夜，风在不停地吹，帐子都快被吹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于风的看法、对于山的看法就变了。你会把它们当作一个生命体来看待，与它们进行对话。这是你在山下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随着登上顶峰，心中会不自然地涌起豪迈感，因为你战胜了不可战胜的东西。这时，诗的语言也完全变了。再比如在南极，每天太阳都在顶上照着，那么单调，只能用平白朴实的语言去描述它。但你最后加起来是一种大美：那种安静、空旷、纯净、可怕……

记　者：中坤这些年积极地扶持诗歌，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骆　英：我原来就是文学爱好者，一个写诗的人，那么我有钱以后呢，自然就想到扶持诗歌。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我认为这个时代不能光有钱，总应该有人来呼吁诗歌的发展。所以，我们设立了中坤诗歌发展基金，拿出3000万来对诗歌进行扶持。当初启动的时候，存在各种质疑。商界就认为这是一种噱头，现在拿钱去扶持诗歌没什么用。诗歌界也觉得不可相信，说这个家伙是不是给自己买名声，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我也写诗。这导致很多人后来看了我的诗，觉得很惊讶，“这诗还行啊”。言下之意，原来他还真是个诗人。

这么多年过来，中坤诗歌发展基金确实在促进诗歌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比如，设立中坤诗歌奖，奖掖那些成就卓越的诗人和翻译家；资助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研究院，全面地开展古今中外的诗歌研究工作；在北京门头沟、安徽桐城及云南普洱等地举办了“中国诗歌朗诵季”；举办了帕米尔诗歌之旅、亚洲诗歌节等大型诗歌活动。现在看来，把做企业挣到的钱用到诗歌上是值得的，社会上对此普遍比较认可，这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记　者：中坤的诗歌项目最近两年有一些变动，比如帕米尔诗歌项目的停止、中坤诗歌奖去掉翻译奖一项、加强对诗歌出版的扶持。

骆　英：帕米尔诗歌项目原来也做得挺好的，但做来做去总是围着那几个朦胧诗人转，我就有点看法了。我们每一年都要对具体项目进行评估，看值不值得继续做下去。我特别不愿意把钱总花在那么几个诗人身上。我希望整个诗歌界都能够来共享这个基金。因此，我们做诗歌项目，眼界要更开阔一些。我觉得，诗歌不能搞圈子化，资源共享，才会公平。

至于诗歌出版，虽然是中坤出钱扶持，但不能由我来决定出版谁的不出版谁的，因为我绝对不直接参与这些项目，我也没有能力去判断谁的诗好。这个事情现在交给北大新诗研究所来做。但新诗所的老先生们都老了，怎么让后面一代人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挑战。在开会的时候，我一再提出，北大新诗所也不应该搞圈子化。可以以北大的人为主体，但应该吸纳更多校外乃至国外的人进来。诗歌出版、诗歌活动，也应该让更多类型的诗人参与。我们的视野，不能光局限于我们熟悉的诗人，甚至我们不喜欢的诗人也应该拿进来。

中坤诗歌奖去掉翻译奖，确实是不妥当的。诗歌翻译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应该有专门的一个奖项去鼓励它。最近两届停掉，是因为有人对此有不同的判断。但是下一届还得把翻译奖恢复，我已经提了很多次了。

记　者：“中日诗歌对话”、“亚洲诗歌节”、“亚北欧诗歌行动”……中坤这些年在推动中外诗歌交流方面非常活跃，有什么样的收获？

骆　英：推动中外诗歌交流，主要目的就是想跟世界各地的诗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中了解各地诗歌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可以较为直接而系统地把中国当代诗歌推介出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和日本、韩国、土耳其、英国、法国、哥伦比亚、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诗人都有过交流。这种交流工作做到哪里，和那里的诗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我们今年将邀请土耳其的诗人来北大当驻校诗人。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外国诗人对中国诗歌很感兴趣。在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说，中国诗歌所表达出来的崭新经验令人感到吃惊；在南美，诗人们也对我写阿空加瓜峰的那些诗作感到好奇，他们想了解一个外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同时，通过交流，我也对中国诗歌有了更大的自信。通过对比，我发现目前中国诗歌的活力是最大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具有很大的张力。中国诗人作品中所描写的一些经验是我们独有的。

接下来，我们主要和哥伦比亚进行更多的诗歌交流。哥伦比亚有个麦德林诗歌节，目前已经举办24届了，影响非常大。我们每年会组织诗人去参加。怎么确定哪些诗人去参加呢？我初步想到这么一个办法，邀请张清华、王光明等主编诗歌年选的人推荐本年度较为优秀的诗人，把名单综合起来之后再确定人选，这样就显得比较公平。

记　者：近期您成为了“世界诗歌运动”首位华人协调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您将会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骆　英：世界诗歌运动是由麦德林诗歌节延伸出来的民间诗歌组织，联合国每年都提供一定的经费给予资助。该组织已发起3年，其目的就是以诗歌促进人类的和谐与进步，搭建人类诗意的精神家园。目前，世界诗歌运动已吸纳了全球200多个诗歌组织，共有90多个诗歌项目，来自132个国家的1000多位诗人成员汇聚于此，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诗人联盟。

2013年11月，我带领诗人团去参加麦德林诗歌节，收到了很好的反响。活动期间，世界诗歌运动的总统筹、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负责人费尔南多·兰登邀请我作为世界诗歌运动组织的协调员，参与未来该组织诗歌活动的核心工作。我们一共13个协调员，每个月都在网上共同商讨未来的一些工作计划。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大的平台把中国诗歌的声音传递给世界。我可以把国内所办的一些诗歌节、诗歌活动纳入到这个大的框架之中，使之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目前正在延庆县办一个国际诗人雕塑园。我想挑选古今中外100位诗人，每个国家一位，邀请诗人所在国的雕塑家为他（她）雕像，然后写上诗人介绍，配上该诗人的经典诗句。这将会起到普及诗歌教育的作用。我正愁这100个诗人怎么挑选，现在依托于世界诗歌运动这个大的平台，我们可以一起通过投票来确定诗人人选。另外，我们将来会举办越来越多的诗歌交流活动，让中国与不同国家的诗人进行互访，达到互相了解、信任的目的。